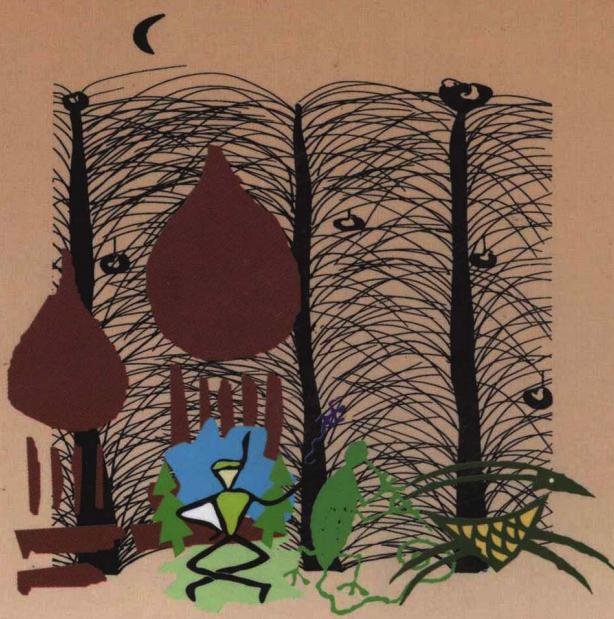


王爱英主编

张大为 著

YSX  
元诗学



张大为 著

YSX  
元诗学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元诗学

张大为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诗学/张大为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0  
(守望文学丛书/王爱英主编)  
ISBN 978-7-80240-075-7

I. 元… II. 张…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1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4861号

# 元诗学

张大为 著

---

策划编辑 刘铭

责任编辑 刘然

装帧设计 华之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市建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87.75印张

字 数 26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268.00元

---



大众版图书，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大众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上编：元诗学或语言现象学诗学导论

<b>导言：走向元诗学的时代</b> ······	3
辩证法与现象学 ······	3
2. 理解语言的两种向度 ······	7
3. 元语言学与元意义学 ······	11
4. 后现代主义与文学的诗化 ······	15
<b>第一章：诗学的元批判</b> ······	21
1. 形而上学：隐喻的神话 ······	21
2. 美学批判 ······	28
3. 语言的家园与语言的牢笼 ······	33
4. 法国式现象学与法国式思维批判 ······	42
<b>第二章：语言现象学的视域</b> ······	54
1. 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意义机制与哲学化方式的转换 ······	55
2. 现象学的功绩 ······	64
3.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 ······	72
4. 转喻—寓言：诗学话语的意义建构方式 与本体论的存在方式 ······	79

<b>第三章：存在的诗性建构</b>	87
1. 老庄之“道”	88
2. 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	96
3. “兴”：诗性存在与诗性文化的意义机制	104
4. 诗意图与现实	112
<b>第四章：元意义的灵光</b>	121
1. 理想国的秘密	121
2. “诗性形而上学”	128
3. 情感与形式：音乐的诱惑与音乐类比	133
4. 纯诗的元意义光线	138
<b>第五章：文学的诗化与诗学的重构</b>	145
1. 传统诗学的理论基础：文体区分与语言的审美模式	146
2. “语言现象学”的视域：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化趋向	150
3. 诗性意义：诗学重构的理论基元	157

## 下编：诗意图人类学提纲

<b>导言：探寻诗意图之源</b>	167
1. “诗体”观念的超越与诗歌文化品性的重建	167
2. “诗意图人类学”的理论构想	171
<b>第六章：“诗意图人类学”：中国古典诗学与解构主义的精神会通</b>	180
1. “无”的发现与“时间”重构：中国古典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基底与解构主义的会通	180
2. “人”的自由与“类”的主体：中国古典哲学主体观与解构主义的会通	186

3. “言”的超脱与意义经验：中国古典哲学语言观 与解构主义的会通	192
4. 意义对流与诗性综合：走向“诗意人类学”	198
<b>第七章：古典境界的现代生长</b>	207
1. 无言独化的真实世界与东方诗性的真理观念	209
2. 语言的透明与意义的解放	213
3. 生命的还原与诗境的整合	218
4. 学科规训的诗性改写与文化灵魂的本真呈现	225
<b>参考书目</b>	230
<b>后记</b>	237

上編

元诗学或语言现象学  
诗学导论



## 导言 走向元诗学的时代

有一种导言是最后写的，本篇导言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篇导言中，不准备全面复述本书的内容，而只是简略地提供一些本书展开的基本理论坐标和进入该论题的基本理论线索，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重复自己，哪怕是在导言中重复正文。导言中也许包含了较多的引文，带着对这些引文的记忆，本书中的一些结论看起来也许便不是那么不可理喻了。

### 1. 辩证法与现象学

辩证法几乎与哲学一样古老。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辩证法意味着某种理性实体或由以使自身实体化的理性的自我裂变、自我差异化和自我戏剧化，而这是指理性将某种断裂、某种非存在裂隙（某种与理性切肤相亲，但永远不可以将之理性化、同化的非存在）置入理性自身的密不透风的实体性存在之中，以此作为意义生产之源（辩证法是一种圆转自如的、动力化的意义生产机制）并用以证论理性自己的存在，犹如水中的水泡可以论证水的存在一样：“但是根据较高的思辨哲学的看法，正是绝对心灵本身为着要成为自己对自己的知识，就在自身中分化，因而设立心灵的有限性，在这心灵的有限性之中，心灵就变成自己对自己的知识的绝对对象。这样，它在它的集团中就是绝对心灵，在心灵和自我认识的地位就是有现实性的绝对。”<sup>①</sup>辩证法是理性对于自身现实性与自身存在的诉求，理性因此相信它从自己的皮肤中探出手来，抓住了现实存在，抓住了语言，至少

是抓住了自身。辩证理性是一个过于专注、过于认真的演员，它把真实当作了戏剧而把戏剧当作了真实，因此，辩证理性的问题不在于其戏剧化的演历，而在于其相信不断超出了自己的皮肤的幻觉。

我们在这里想提及的是比较晚近的辩证传统的孑遗：阿多诺与詹姆逊。辩证法和修辞学有着宿命般的联系。在理性还没有以实体化的、形式化的存在挤入形而上学的意义框架时，我们记得苏格拉底是作为滔滔雄辩的修辞家来进行真理的辩证的。柏拉图虽然以抽象空洞的质料性的理念进行辩证推演，但其对于戏剧化的对话文体的倚重不次于诗人式的倚重。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阐释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放大了的修辞批评，或者修辞批评的一种放大过程，只不过，修辞在保罗·德曼那里意味着对于语法与逻辑的否定，而在詹姆逊这里，修辞学仍然保持其对于政治无意识的刻写功能，政治无意识通过语句的生产来表征自身：

……这种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极力把两种无法比较的现实两种独立立的代码或符号系统、两种异质的和不对称用语，以单一的修辞方式联系在一起，如精神和物质，个人经验的事实和体制社会的更大的形式，存在的语言和历史的语言等。<sup>②</sup>

这里是詹姆逊对于阿多诺的解释，然而也正是詹姆逊本人的思想和方法。它所包含着的仍然是黑格尔“语言是纯粹自我本身的特定存在”<sup>③</sup>的辩证理性的语言神话，因此，语言的修辞实体就类同于作为“精神”裂变而成的“严格的各个方面”的统一体的中项<sup>④</sup>。黑格尔之后的辩证法企图提供一幅作为世界的正向反映的哲学图画<sup>⑤</sup>，而不是视网膜上的倒立映像（马克思），马克思也强调从理论世界向生活世界的下降运动。但是这里所缺乏的仍然是一种对于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哲学语言的自觉、对于哲学概念的自觉，或者说对于哲学

概念的非概念方面的自觉。在詹姆逊那里，这种哲学语言和概念的自觉还停留于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方面，因此达到的仍然是对语言的某种意义方式的神话式的肯定——这也正是詹姆逊所接受的关于语言的辩证理性神话涉及的恰恰是作为自身异化的“精神”、但本身却还不是“精神”的“语言”的原因：“……这种语言还不是精神，如果精神是指那具有完全的自知并能将自己充分表现出来的东西的话”<sup>⑥</sup>：

这里所涉及到的能量的突然交换，无论就并列因素的哪一种来说，实际上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其实，要想了解这些因素意外的联系，我们必须先知道每一个因素究竟是什么，它本身有什么特征。真正的情况是，在转瞬即逝的一刹那间，我们瞥见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宇宙，其中，不相连贯的现实无论乍看之下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也总以某种方式相互牵连，纠结交织在一起，其中，对机会的把握短暂地将目光所及的一切重新聚合成一种交叉的关系网，偶尔也暂时地变成必然。<sup>⑦</sup>

这是对于阿多诺《新音乐哲学》中一段文本的感悟与解析。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的文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事物”，甚至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客体”（同上）。在对语言实体的诗性经验中，在诗意的松弛下达到的对于惯常的意义关系与意义模式的融解与转换中，达到对存在场景的本体论变更——这样的结论并不为错。但是所谓的客体世界的“相互牵连，纠结交织”，却仍是紧张的辩证理性的客观化投射，辩证理性仍然穿透了诗性语言或语言的诗意。实际上，这段文本中，语言的诗意正在于意义在转喻方向上的多向对流，它正是作为理性的融解剂和隔离带出现的。阿多诺在他的阐释者詹姆逊这里遭到了有意无意的误解。阿多诺的看法是，传统上概念被当作一种自我满足的总体，但实际上，所有的概念都涉及种种非概念的东西：“……非概

## 张大为·元诗学

---

念性通过它的含义传达了它的意义，反过来又确定了它的概念性。指称非概念性……是概念的特性，反过来也一样：概念作为从属于实体的抽象单位将从实体那里脱离出来。否定的辩证法的要旨就在于改变概念性质的这种倾向，使它转向非同一性。洞悉概念中非概念结构的特点，就会结束概念带来的强制性同一，只要不受到这种反思的阻挠。对于概念自身意义的反思，就是不再把概念外表的自在存在看成一个意义单位。”<sup>⑧</sup> 詹姆逊所感到的诗性是使存在不会与（哲学的）概念语言混同的东西，是将辩证理性从自己的皮肤中探出的企图擒获语言的利爪斩断的东西。否定的辩证法是对于洋洋自得的、粗鲁的辩证理性的一种抑制，由此它导向一种对于哲学概念语言的积极的否定。这样，否定的辩证法通向了一种对于超验存在的现象学态度，也就是说通向了一种括号中的正向的哲学图景，通向了一种“语言的内在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语）的意义演历或者说“内语言意义”的演历：“哲学家不是在语言学的飞瀑中戏水，而是对它进行周密的思考。……只有在语言中同类的东西才认识同类的东西。……跟一般的见解相反，辩证法中的修辞学要素在于内容方面。”<sup>⑨</sup> 如此，否定的辩证法的现象学态度是一种语言现象学的态度，而现象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不过，辩证法作为后思因为相信理性不断超出自己的皮肤而攫取了语言，而（胡塞尔）现象学作为不断深入的内在性的反思失去了语言。所以，辩证法占据的是“后语言意义”，现象学占据的是“前语言意义”——我们以后会把这两个范畴连同“内语言意义”扩展到一个远远超出哲学意义领域的层面上。而这里首先需要做的，是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中“概念的觉醒”所提示的语言的觉醒，从另一头推出认知理性的黑暗隧道。

## 2. 理解语言的两种向度

在本书中，我们起用了两个因其容易遭到误解而令人不安的范畴“隐喻—象征”和“转喻—寓言”，来标示两种全然不同的意义机制和意义方式。前者意味着一种认识论层次上的意义复制，后者意味着一种本体论层次上的意义建构；前者意味着意义的内在性、封闭性，后者意味着意义的开放性、时间性。因此，前者因其在有形无形的理性支架内意义的单向传递，而意味着干燥的意义对于理性的依附，后者因其在最湿润、最具体的存在场景上的意义的多向对流，而意味着丰裕的诗意。人们不会不明白对于这两个范畴的新近发明来自后现代主义理论和诗学。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得出的关于它们的结论，是以现代主义向其反面的推导完成的，因此 这些结论它们本身还只是在现代主义的平台上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遥远眺望和窥探，而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还处于一个被误解的意义框架和意义线索内。在通常的理解当中，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颠倒的关系。对于它们二者的正确理解需要一种从后往前看的时间观、历史观和自下而上的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无历史和无时间的玩世不恭只是表明，历史和时间是贴着我们皮肤的东西，而不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框架和意义形式；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体论主旨”只是表明对任何理论化的本体论确定性的怀疑，因而通过诗性语言将其拉近和具体化为一个日常性事件。所以，我们应该对隐喻—象征和转喻—寓言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种颠倒，这种颠倒本质上是对形而上学意义机制和意义方式的颠倒，这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并未明确完成的颠倒：不但应该抛开传统上在隐喻—象征的视野内赋予转喻—寓言的外在性和形式化特征，不但应该赋予转喻—寓言以超出隐喻—象征视野的元始性并且将原初的隐喻—象征设定为转喻—寓言，而且必须将转

喻—寓言本身当作转喻—寓言：这意味着搭建并进入一种全新的意义引线和意义网络。

这两个范畴也意味着语言从形而上学的理性—逻辑脚手架上觉醒，以及对这种觉醒的理解的两种方向。前面已约略提示过，不要说詹姆逊把语言看作密不透风的“诗意图体”，就是阿多诺所谓“辩证法……意味着试图批判地挽救修辞学要素，意味着事物和表达的相互接近达到差别消失的程度”<sup>⑩</sup>的情况下，语言也还有一半镶嵌在理性的岩体内，无论它是作为诗意图体还是半透明的材料（阿多诺、以及认为语言是“存在既澄清又遮蔽着的到来”的海德格尔），它都和在作为微不足道的外在符号的形而上学中的情况一样，还笼罩在隐喻性意义的强大光柱内。因而，即便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破碎，也必须一种文本的抽象的同一性作为先在的假定，而这正是以抽象的对象化的同一性来看待语言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意义方式，也是一个“自身封闭的意义作用”<sup>⑪</sup>，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后语言的同一性意义。所以保罗·德曼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把解构批评带入新批评式的细致化境地，而在于他把足以作为意识形态围困自身的法国式的解构思维，带入一种作为积极的否定性的修辞学运作。保罗·德曼因此才会说出这样的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的批评的话：“那仿佛把文学和哲学归拢在一起的，是同一性或具体性的一种共同的匮乏。”<sup>⑫</sup>

面对形而上学及其意义机制与意义模式对于语言哲学的强大吸引力，要在前者的磁场中使语言真正地苏醒，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实现现象学的语言学转换和语言哲学的再现象学化（这里当然包含着我们对于现象学的重要转折性意义的评估）。这样，我们便来到或进入语言现象学（linguistic—phenomenology）的视域中。当我们疲惫地挣脱西方理论的巨大磁场，当我们穿越那钢铁一样黑暗和锈迹斑斑的概念的森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形而上学的传统不光

是西方人的现实，也是我们自己思想中的现实——我们发现，一个遥远而又至为切近的风和日丽、水碧花红的诗意图早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说它遥远，是因为它至少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一个早已飘逝的古老的梦；说它切近，是因为它也许还深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拳拳之心的无意识深处。或许，只是因为这个心灵深处的诗意图乌托邦的作为无意识的召唤，才给予了我们在异乡中艰难跋涉的力量和勇气：

……每一个字，像实际空间中的每一个事物，都与其附近的环境，保持着若即若离、可以说明而犹未说明的线索与关系，这一个“意绪”之网，才是我们接受的全面印象。<sup>⑩</sup>

……中国古典诗的语法，利用“若即若离、可以说明而犹未说明的线索与关系”，而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由他们直接参与和感受的“如在目前”的意境……（同上）

……诗人利用了文言特有的“若即若离”、“若定向、定时、定义而犹未定向、定时、定义”的高度的语法灵活性，提供一个开放的领域，使物象、事象作“不涉理路”、“玲珑透彻”、“如在目前”，近似电影水银灯的活动与演出，一面直接占有读者（观者）美感关注的主位，一面让读者（观者）移入，去感受这些活动所提供的多重暗示与意绪……<sup>⑪</sup>

这是一种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受到隐喻—象征式的意义机制裹束的语言的诗性的自由，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由于停留在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模式与意义网络中而具备的语言的诗性的质地。就中国古代诗歌中语言对于物象、现象的呈现方式而言，就语言现象学诗学因为某种哲学—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意义上的必然性而切近中

国古代诗性哲学与诗性文化的关键点而言，从意识现象学到语言现象学的转换或语言哲学的再现象学化，似乎倒不是一种悬空的、纯逻辑的生硬推演与切换，语言现象学这个提法似乎也有一点现实指向的意义。

为了防止根据上述引文中的理解可能会导致的在后面的章节（第四章）中会论及的另一种关于语言的神话，有必要在这里提前指出，诗性意义带来的启示是语言对存在既呈现又无法呈现，语言与存在既同质又异质，因而归之于“存在之语言 / 语言之存在”的不可化约的语言辩证法。在内在性与外在性、反思与后思作为形而上学理性的占梦的梦征被取消的情况下，现象学和辩证法几乎变得无以区别。我们只能根据“前语言意义”和“后语言意义”以及这两个概念的字面意义，约略给予它们一点在使用中的区别：现象学倾向于语言在前语言意义维度上的自我呈现，辩证法倾向于语言在后语言意义维度上的自我论证。

因此，黑格尔的思维辩证法也延伸到了语言辩证法：

语言是一种能把自己从自己本身分离开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作为纯粹的“我 = 我”，变成为自己的对象，却又在这种对象性中保持自己为这一个自我，并且直接与别的自我汇合一起成为它们的自我意识。……<sup>⑮</sup>

对于在黑格尔这里集其大成的形而上学来说，语言是逻各斯的皮肤，语言的从外在性的方向上进行的自我分离、自我裂变只是为了从内在性的方向上自己把自己包裹起来。语言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界面。对于完满的形而上学的运作机制来说，语言既是永远无法超脱的皮肤，也是可恨的不能化约的剩余物。因此，语言不可能再作为僵死的符号保持沉默，它必须牢固地粘合于实体化的理性之上一起被